

近代 天津

名人丛书

天津是中国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在中国近代史上，众多有影响的风云人物出自天津。历史不会忘记他们。这部丛书，记述的就是他们的故事。

徐世昌



黎元洪



曹錕



近代天津 十大寓公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近代天津名人丛书

近代天津十大寓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天津十大寓公/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著.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5
(近代天津名人丛书)
ISBN 7-201-03332-8

I. 近… II. 天… III. 名人-生平事迹-中国-近代 IV.
K8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5792 号

EC51/03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成其圣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政编码:300020)

发行科电话:022-27307107

天津武清县长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875 印张

字数:204 千字 印数:1-3000

定价:18.50 元

总 序

黄炎智

星移斗转，岁月悠悠，转瞬间本世纪行将结束，新纪元即将到来。在世纪之交，回首天津百年之历史，真可谓沧桑历尽，覆地翻天。自明朝设置天津卫以来，至本世纪末，天津尚不足 600 年历史；但自上世纪末至今的百余年间，天津却饱经风霜，从外辱内患到阅尽人间春色，特别是上世纪末叶至本世纪中期，天津作为京畿门户、海防重地、北方经济中心，中国近代史上很多重大事件都与之有密切关系，很多著名历史人物都在天津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曾几何时，各路豪杰在此舞旗弄潮，各方志士在此砥砺图强。于是，军事救国者有，实业救国者有，教育救国者有，科学救国者有……芸芸众生，不一而足。然而大潮之中，不免泥沙俱下，除仁人志士风云际会于津门外，也有来此淘金的、冒险的、寓居的、醉生梦死的。正是这种珍珠与鱼目的共存，构成了五彩斑斓的近代天津，天津也因此而名传天下。

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进步，都离不开人的活动，天津的发展更是如此。纵观百年，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各种不同的人物活跃在天津这个舞台上，从不同侧面或者推动、或者阻碍天津乃至中国历史的发展。如果把这些历史人物的活动记录下来，并将其真

实地再现,人们不仅可以更多地了解这些历史人物,而且可以更全面地了解过去,了解天津。有鉴于此,1996年下半年,首先由市政协文史办公室的汤洪、方兆麟等同志提出来编辑一套“近代天津名人丛书”的设想,我对他们的设想十分赞赏,随即提到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会议上讨论,经过谢天培、南炳文、孙维甫、乔维熊、杨大辛、田桂林诸同志的充分研究,认为这件事不仅可行,而且十分有意义,对于宣传天津、进一步提高天津的知名度很有必要。同时一致推举我任该丛书的总主编。我当时作为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义不容辞,欣然接受。于是这个设想被正式定下来,列入工作计划。为了使这个计划更具可行性和操作性,由我主持又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具体研究编辑方案。参加第一次座谈的同志有张澜生、徐景星、罗澍伟、乔维熊、杨大辛等同志,大家兴趣很高,七嘴八舌一下子提出了近20个选题。经过议论,进一步明确了编书的宗旨、编辑体例,确定了首批编辑书目。同时也确定了担任这套丛书各分册主编的原则。大家认为各分册主编应尽量由熟悉选题的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担任。

然而编这样一套丛书并非易事,不仅要组织人力,还要下很大力量去收集材料,更重要的是出版这套丛书要有经费,有了“经济基础”这项工作才能有保证。为此,我让文史办公室尽快起草个申请专项经费的报告,并将报告立即转报给市政协主席刘晋峰,晋峰主席很快将此件转市政府张立昌市长。立昌市长非常重视此事,很快批下了经费,从而使这项工作的开展有了保证。经过各方面近两年的努力,现在终于看到这套书要陆续出版了,怎能不令人欣喜!可以说,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是集体智慧和力量的结晶,是各方面大力支持的结果。

首批确定的6个选题,即近代天津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收藏家、寓公、买办和京剧票友。在编写过程中既考虑到了其史料价值,同时又注意到了内容的可读性。每本书收录10人左右,都是经过与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充分研究后筛选出来的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各书的作者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人物做了翔实、生动的记述,从而使那些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又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如周学熙是如何兴办北洋实业的?范旭东是如何创制出“红三角”牌纯碱的?宋斐卿是怎样纺出“抵羊”牌毛线,并使之行销全国的?教育家严范孙、张伯苓是怎样兴办南开教育的?民国初年林墨青是如何兴办社会教育的?收藏家张叔诚是如何得到无价之宝“窑变观音”、最后又怎样被毁掉的?夏山楼主韩慎先除了是“名票”外,他在鉴定与收藏文物方面有哪些“绝活”?北洋时期的总统、总理及一些大军阀下台后来天津干了些什么?清末宫廷大太监“小德张”出宫后在天津怎样度过了他的晚年?天津京剧名票“三王”对京剧发展做出了哪些贡献?天津早期的“四大买办”是哪些人?他们都做了些什么?等等、等等。我相信通过书上那生动、翔实的描写,不仅可以使读者看到一个个丰满、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而且还可以知道许多鲜为人知的佚闻和趣事,而这些恰恰是在一般历史书籍中难以看到的。这些历史人物虽然生活在天津,但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只局限于天津,而是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的一个侧面,因此这套书对于学习中国近代史、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宣传天津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今后我们还将不断地充实这套系列丛书的内容,陆续向读者推出新的书目,如天津著名的商人、著名的银行家、著名的报人、著名的曲艺家、影剧名流、社会名流等等。总之,我

们将通过这套书使读者更加了解天津、认识天津,也可以为后人留下一点点有用的资料。同时,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同志参加到编著这套丛书的工作中来,为发展天津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这套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各方面的大力支持,首先是作者们的辛勤努力。各书的作者都是学有专长的人士,而且在写作过程中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去收集资料,由于他们的努力为成书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再者,是各书的主编们,他们都是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或各自主持某一方面的工作,他们在工作的百忙之余,积极策划,审定稿件,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去粗取精,去虚存实,才使这些书能顺利付梓。还有这些书的责编与出版者,也都花费了不少精力,一遍遍的审校,使这些书能最后出版发行。在这里我谨代表丛书编委会向这些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诚然,编辑这样一套丛书,特别是在历史资料比较缺乏的情况下,难免有疏漏和不妥之处,敬希读者指正和谅解。

谨将此丛书作为世纪之交的献礼,愿人们接受它!

序

杨 大 辛

“寓公”一词，古已有之。据《辞源》解释，寓公系指失去领地寄寓他国的诸侯而言，后来也泛指寄居他乡的官吏身份之人。及至近代，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封建皇室、贵族、重臣顿时失去权势，被称为遗老遗少，成为被时代抛弃的落伍者；民国建立后，北洋军事集团攫取了政权，政局动荡不安，派系纷争乃至穷兵黩武，权柄频频易手，军阀、政客忽而上台忽而下野，政坛人事朝夕嬗变。这样，社会上就出现了一批批所谓寓公的特殊人物，而寓公生存的一大特点，则是栖身于租界，即托庇于外国势力之下。

天津距当时政治中心北京，近在咫尺，又是外国租界最多的繁华大城市，因此很自然的成为寓公麋集之地。就清朝遗老遗少来说，地位最显赫的莫过于逊帝溥仪，就曾在天津租界度过 6 年多的寓公生活。其他贵胄人物如溥仪的父亲载沣、庆亲王载振，以及满汉臣僚载涛、那桐、铁良、荣庆、李准、张鸣岐、马玉昆乃至太监张兰德（小德张）等等，都在天津租界里构筑有安乐窝。北洋政府的许多要员，还在台上掌权时便在天津安置了私宅，以为退身之路。北洋政府的五位大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在天津租界都建有奢华的宅邸。北洋政府时期的 32

届内阁，有三分之一的总理，如段祺瑞、靳云鹏、唐绍仪、张绍曾、龚心湛、颜惠庆、顾维钧、熊希龄、梁士诒、高凌霨、潘复等，都曾在天津或久居、或暂住，设有公馆。内阁部长一级的人物更是大有人在，名声显赫的如曹汝霖、叶公绰、王揖唐、王克敏、朱启钤、曾毓隤、段芝贵、鲍贵卿、陆锦、刘冠雄、吴毓麟、吴光新、杨文恺、张志潭、朱深、张弧。至于下野的督军、都办、巡阅使和省长一类的人物也是多不胜数，如张勋、倪嗣冲、孙传芳、王占元、陈光远、齐燮元、卢永祥、李厚基、田中玉、王怀庆、汤玉麟、张敬尧、孟恩远、吴俊升、李廷玉、张作相……等而次之，寓于天津的一般军长、师长、厅长、局长之流，夸张一点说，多如过江之鲫子。有人曾做过估计，天津租界里的寓公先后不下 500 人之多，这对天津社会构成一种潜在势力，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风气上，不可能不对天津这个工商业城市产生深刻的影响。试举一例，一向为世人所赞赏的天津租界里各种风格的小洋楼建筑，其中有相当多数属于寓公的住宅。

形形色色住进租界的寓公们，他们的价值观念、人生态度与生活方式，因人而异，各有不同。一般说来，曾在宦海浮沉，权倾一时，下野之后在政治上是不甘寂寞的，仍在窥测时机，以图东山再起。这样，租界就成为政治上的“避风港”。突出的例子就是“复辟狂”溥仪，最终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跑到东北当上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北洋政府垮台后，蒋介石掌权，有些寓公通过各种渠道转而投靠国民党，为蒋介石所网罗。日本特务机关基于侵华目的，培植亲日爪牙，对北洋军政人员极尽拉拢收买之能事，有些人醉心名利，自愿上钩，甘受驱使。在 1937 年 7 月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并在占领区建立了伪政权以后，这些人丧失民族

气节，充当了汉奸头目，堕落为历史罪人，遗臭万年。

在物质生活方面，寓公当年在位得势时，无不聚敛有术，腰缠累累，因而在退隐后有条件过着阔绰奢侈的生活。有些人恣意挥霍，娇惯子女腐化堕落，不事生产，坐吃山空，不一两代人便荡尽家财而败落。但也有许多寓公治家有方，经营有道，投资于工商业、房地产业、金融业，以及办盐务、开当铺。其中较有实力的如黎元洪、倪嗣冲、周学熙、龚心湛、曹汝霖、鲍贵卿、吴鼎昌、颜惠庆、陈光远、王占元等人，多财善贾，在工商界或金融界享有盛名，其资金额在各该行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可以这样认为，寓公们的巨额财富多系搜刮而来，投资实业的动机也可能出自盘剥牟利，但客观上有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毕竟做了利国利民的好事。

很多寓公在脱离政坛以后，无官一身轻，不再涉足宦海，或闭门读书，或书画自娱，或皈依佛门，宽松地颐养天年。有人还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兴办善举，造福地方。不少寓公在日本建立伪政权后，虽然受到日伪势力的威逼利诱也不出任伪职，保持了晚节。有些寓公对子孙管教甚严，促其勤奋读书以致成为国家栋梁之材者，实不乏其人。总之，寓公在位时政绩毁誉不一，退隐后为人处世之道亦各有千秋，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本书列举了十位寓公加以评价剖析，在天津社会影响大的寓公当然不止区区此数，不过选择几种类型，举一反三，不难了解在旧社会寓公这一特殊阶层人物的生活经历与精神面貌，同时也有助于认识那个动乱时代的社会现象。如果读者在这方面能有所领略，实为编者所企盼者。

目 录

总序	黄炎智(1)
序	杨大辛(5)
“文治”总统徐世昌	焦静宜(1)
善于经营实业的总统黎元洪	张树勇(35)
退出政坛的总统曹锟	于 辉(60)
皈依佛门的总理靳云鹏	张 柱(77)
辩帅张勋的退隐生活	潘 荣 魏又行(105)
亦官亦商的倪嗣冲	郑今浣(132)
“钱裕子”鲍贵卿	邵桂花 陈志新(153)
息影津门的孙传芳	何德骞(176)
我父庆亲王载振	爱新觉罗·溥铨(213)
太监小德张寓公生活	张继和(229)

“文治”总统徐世昌

焦静宜

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其后随着北洋军阀的攘权，带来的却是动荡混乱、政治纷扰的局面。新的政权虽然引进了西方的某些政治制度，可是在这个长期受封建统治的国家里，它的生存缺乏适宜的土壤和环境，因而呈现出一种扭曲的政治状态。于是，一大批前朝显宦，沐猴而冠，摇身一变，由清朝遗



徐世昌

老成为民国新贵。以袁世凯为首的大小军阀，手握重兵，遂窃踞民国政府总统、督军、镇守使之类的要位，组成了以北洋军阀、政客为主体的北洋政府。袁世凯以其北洋军阀首脑的“英望”，无可争议地篡取了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的职位，而分杯羹于其袍泽，使各方大体相安，及袁氏称帝自毙后，所属势均力敌，各不相下，其共同觊觎者，莫过于总统之最高职位，遂各主派系，纷争混战，连年不已，无不以得总统职位为鹄的，于是黎元洪、冯国璋等

武夫先后钱位，然又不想久居其位。而能以纵横捭阖的手段周旋于诸军阀派系之间、乘隙而窜取总统职位，并以能与袁世凯在位年限相媲美者，厥惟出身科甲，位致通显，以能文善书自鸣的文人总统徐世昌。

纵观徐世昌生平，有两最重要的经历：他从1886年中进士后入翰林院，先后任翰林编修、国子监司业、商部左丞，陈兵处提调、捕部左侍郎、军机大臣、督办政务大臣、巡警部尚书、东三省总督、邮传部尚书兼津浦铁路督办大臣、体仁阁大学士、皇族内阁协理大臣、军咨大臣等，这一连串的职位，实际上就是徐世昌在清王朝官场上的升官图。因此，徐世昌应是当之无愧的清朝遗老。

然而，徐世昌之所以名声显赫，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还有一段曾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经历。辛亥革命后政治风云变幻，时而民主浪潮高涨，时而封建残渣泛起，但更多的是北洋军阀统治下各派系之间的明争暗斗，使整个社会经常处于波澜迭起、动荡不安之中，徐世昌却寓静以动，应时而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是泰然处世的“不倒翁”。北洋军阀头目袁世凯死后，是各派系争斗最激烈的年代，总统总理嬗替频仍，官僚政客成了被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木偶。手无一兵一卒的徐世昌却在1918年到1922年间被请出来，一连做了三年多中华民国大总统。这决不是天赐良机，而是徐世昌纵横捭阖，工于心计的结果。然而，以文武并不是医治当时社会弊病的灵丹妙药，他终于还是被军阀赶下台，到天津租界做寓公去了。

可以试想，满腹旧观念的先朝“相国”跃然成为共和政体的首脑，这本身就是对这个时代的嘲笑。而在中国的历史上，又重

复过多少次这样的玩笑啊！作为徐世昌这个人，我们今天完全不必苛求他，因为回顾历史，他的经历既能够使我们看到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缩影，又可以看到历史大变动时期耐人寻味的人生际遇。

一、进士及第 循阶攀登

徐世昌，字卜五，号菊人、弢斋、东海，又自号水竹村人。清咸丰五年（1855年）九月十三日生于河南汲县，然其先世系自浙江鄞县迁大兴，再迁直隶天津县，遂籍为天津人。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徐世昌曾亲订《续修天津徐氏家谱》（养喜堂印本），可见徐世昌对隶籍天津情有独钟。以后，徐世昌出将入相皆以天津为根据地，晚年更是在天津生活，直至民国28年（1939年）6月5日以85岁高龄病逝于天津。若以此论，徐世昌一生当与天津有不解之缘。

徐世昌曾祖名廉谔，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丙申进士，官湖南知县；祖父名思穆，官河南中河通判；父亲名嘉贤，未仕早卒，从此家道中落。年仅七岁的徐世昌与母亲和五岁的胞弟世光相依为命，寄居开封城内双龙巷。其母刘氏系清季桐城派古文家刘大魁的后代，教子很严，但徐世昌少年读书并不出色，只是小楷写得不错，于是便以其所长在当地县署缮治文牒，靠作些抄抄写写的文字工作，每年可得数十金贍家糊口。当时的徐世昌为谋衣食而奔波，难能胸怀大志，及至27岁，他的理想尚在“他日或大挑，或议叙，或幸成进士即用令，若分省得河南，除杞县、太康，必师孟尝君广纳食客”。意仅志在温饱，至好能够几任县官，可招

呼朋友饮食而已。

正当徐世昌埋头沿着文人“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循阶攀登的时候，他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与其一生命运相关的人物——袁世凯。当时袁世凯嗣父袁保庆在河南团练大臣毛昶熙处充营务处，袁世凯亦因屡试不中，郁郁不得志而随之居于开封城内，与徐家相距很近，两人由此而相识。袁、徐二人虽然一个是少年不羁的望族之后，一个是家境寒素的落拓文人，却意气相投，又徐比袁年长四岁，因而结为金兰兄弟。光绪八年（1882年）壬午乡试时，徐世昌因生活拮据难以入京应考，当时袁世凯慷慨解囊资助，使之得以成行。就在这次科举考中，徐世昌中式第145名举人，其弟世光也以第95名中式，由此奠定了徐世昌仕进的第一块基石。

光绪十二年（1886年）丙戌会试，徐世昌以殿试二甲、朝考一等中进士，遂授翰林院庶吉士，时年32岁。三年考满，授职编修。徐世昌身居京畿，初跻官场，深知此间关系今后的前途命运，因而格外谨慎，不料不仅未讨得上司的喜欢，后落得翰林院掌院学士李鸿藻一句“虚骄过人”的考语，加之缺乏奥援，竟使徐世昌在翰林院一边做了六年编修而未获得提拔。编修虽是京官，并无实际职务，且位仅七品，俸银很少，手头不免拮据，以至他三节对老师的致敬，仅能送二两银子，其生活之清苦于此可见。徐世昌徒托空志，十分烦恼，对在此的前途逐渐失去了信心，便想改变处境，欲谋跳槽，甚至不惜降格，亦愿外放州县，即或暂时不能腾达，也免得在京中受穷。当时他的两个堂叔都在地方做官，一在湖北钟祥任知县，一在江西德安任知县，徐世昌便请其叔父代谋职位。其叔父久在官场，深知攀附之难，认为编修虽品阶不高，但

毕竟接近上层,升迁的机会多于地方,因而劝徐世昌稍安无躁,嘱其安时待时,生活方面的困难可以酌予补助。徐世昌两权其利,还是听了叔父的话,打消了跳槽的念头。为了补贴生活,他一度前往直隶省定兴县鹿姓人家教书。不久,为节约开销又将家眷也接了去,住在城里亲戚家。徐世昌早年由于仕途郁不得志,以致生活颇为清苦,因此更激发了他靠个人奋斗的决心;也由于无人倚重和提携,所以他只能娴于公务和在人际关系方面更加工于心计;同时,艰窘的生活需要他量入为出,时时感觉到文人纳敛之不易,故而养成了锱铢必较的习惯,以致一生被世人讥为慳吝。

为了一鸣惊人,徐世昌做了多种努力。19世纪末叶,正值大清国的多事之秋,尤其甲午一战,朝野震惊。对反侵略之策,群言庞杂,纷呶不休。当时翰林院37人由侍读学士文廷式领衔奏请“密连英德以御倭人折”,主张联合英德两国以制日本,这是当时文人聊客的论点之一。徐世昌不甘后人,趁机连署。虽得忝列其间,但又感觉此种论点究属泛泛之谈,不得要领,所以又单衔陈奏,请召重臣,以定大计。内称:“今日所急,患无兵耳,患无饷耳,窃谓苟得其人,则十万之兵,千万之饷,不日而可集;苟不得其人,则虽以数十年简练之师,求一战而不足。”虽然此疏是徐世昌为奏召推崇湖广总督张之洞。但其中对人才问题的议论则也反映了他这个被埋没的“人才”对当政者的呼吁,其单衔上疏似乎更意在引起当政者的注意。然而这一次在主观上虽然给他带来的是又一次失望,但在客观上,也反映了徐世昌在时局险危之际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和思考,因此,日后徐世昌将此疏收入自编的《退耕堂政书》中,并列为奏议之首篇,或许其用意正在于展示他

官居低微之时就早有报国之志。但对当时的徐世昌来说，翰林院似乎是一口深井，他苦苦挣扎却难浮出水面。

二、乘时逢会 直上青云

正当徐世昌茫然而无奈的时候，一个机遇来到了他的面前，随着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朝野上下群起呼吁必须改革旧军队，建立新式军队。清政府终于下决心改革军队，派袁世凯精练新军。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袁世凯受命小站练兵，急需网罗人才。新建陆军是日后形成北洋军阀集团的班底，也是袁世凯成为北洋军阀集团首脑的资本。因此，必须很快培植一批亲信，安插于要津。当时，除选拔了一批军事学堂出身的将弁之外，尚需文职人员，于是，便邀约徐世昌前往充任参谋营务处，赞襄戎幕，编练新军。当时风气重文轻武，稀有以翰林院编修充任营务处者，但徐世昌则不惜降格以求。一因与袁世凯有总角之交，与自己识见相合，或可有所作为；二在不失翰林院编修本职的情况下，又可得月薪数百元，使生活有所改善，遂即入袁幕，成为袁世凯的主要谋士。从此，徐世昌的仕途逐渐顺达，而与袁世凯亦交好日密，在政治上更是契合无间。与此同时，徐世昌的境遇开始发生转变，一是他的翰林身份虽曾使他蹭蹬多年，而厕身军中反倒成为文人资历最高者，因此，那些出身行武的军官以得到其门墙为荣，于是，袁世凯麾下之张勋、姜桂题等人纷投帖拜师，对其格外尊重；二是由于地位的改变，徐世昌与后来成为北洋军阀集团骨干的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等人得以结交，为此后官场上相互攀援利用编织了一张关系网。